

百五人瑞，錢存訓先生一生行述

Tsien Tsuen-hsueh Passes Away at 105

許倬雲（Hsu Cho-yun）*

編按：著名漢學家、東亞研究圖書館學家錢存訓先生，於2015年4月8日在美國芝加哥逝世，享年105歲。哲人遠逝，殊感哀悼，本刊特邀許倬雲院士、潘銘堯博士及錢孝文先生，分別撰寫、整理錢存訓先生一生行述、著述及年表，以茲紀念。

在美中國圖書館學前輩，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前館長錢存訓先生，於2015年4月8日（應為4月9日），回歸道山，從他1910年出生開始，享壽一百零五歲。錢先生碩德懿行，學界大老，仁者大壽，他的一生跨越超過一個世紀。這一個世紀，正是中國轉變極多的時代，也是世界在各方面經歷了許多變化。

這個世紀，中國擺脫了兩千年來的帝制，經過三次革命，又經歷了無數次列強的欺壓與日本全面的侵華。中國的文化，也經歷了大幅度的改變，從保守到革新，到新文化運動，到最近半個世紀來，大陸上經歷不斷的顛簸。1949年，中國分裂，海峽兩邊的中國人，至今還在對立的狀態。在二戰之後，華人寄留在美國，人數眾多，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遷徙。臺灣處於本土與中國之間的兩難之局。海峽兩岸與海外的華人，身處於時代的動盪之中，在傳統和現代之間，在中國與世界之間，如何調適，既有困惑，也有奮鬥。

在世界的整體局面，這一百年來，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，迅速地發展，今天科技文明的影響力，籠罩每一處人類的生活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鬥爭，兩次發生全球性的熱戰，和長期延續的冷戰。中國與西方之間，既有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舊恨，又有轉向西化的因緣。尤其美國與中國，曾經長期是友好的關係，而在上

述的背景，卻是恩仇交織，時敵時友。於是，居住在美國的華人，也在這夾縫之中，常常有無所措手的難局。

以上各個階段的變化，驚濤駭浪，各處的中國人，都曾經有過生

命中的巨大起伏。錢先生一生，經歷了上述的時代劇變，大時代的變局，影響他的一生。在這一百多年來，錢先生自己確實在生命的不同階段，積極地成就了他的貢獻。他的一生，可以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個方面，分別敘述，呈現一代巨人在艱困之中，如何因應時勢，努力地參與時代的變化。

1957年到1962年之間，我在芝加哥讀書，錢先生和師母，對我照顧備至。因為我的身體傷殘，他們給予



錢存訓教授

*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美國匹茲堡大學榮譽教授。

長久的幫助，從下飛機那一時刻，錢先生來接機，到畢業芝大回臺時，錢先生又送我上飛機。五年來，每逢我住院開刀，進出醫院，以及療傷時期，從醫院到課堂，錢先生領我出院，送我回院。平時，師母關懷我的生活，猶如家人。上課時，每天的中午，錢師母準備兩份午餐，一份是錢先生的，一份是我的；週末假期，錢府就是我的家。在圖書館讀書時，錢先生總是特別替我拿一些要看的書，自己用小車推到我的桌旁，免除我提取書籍的困難。這份家人子弟一樣的待遇，我現在已經八十五歲，那一段歲月的一切，念念不忘，行文至此，淚如雨下。有此機緣，我對於錢先生的生平，以及他的為人作事的風格，與讀書治學的心得，都有相當長期而近距離的理解。錢先生撒手歸去，我義不容辭，應當將所知所見，報導於學術界，讓大家對這一位學術界的楷模，有大概的了解。錢先生的猶子錢孝文先生，曾經編過錢先生的百歲年譜，現在還在繼續補充資料，準備編成完整的傳記。本文敘述，當然不可能像孝文兄，正在進行的著作同樣完整，不過在他大作完成以前，本文作為先驅之作而已。

錢先生，字公垂，諱存訓，1910年元月11日（因為陰陽曆換算的錯誤，他的官方資料出生日期是1910年12月1日），出生於江蘇省泰縣，書香門第，翰苑世家，其尊翁曾有清代樸學的著作，因此，他一生在學術界，也是家學的傳統。他六歲時，在私塾讀書，接受四書五經的教育，後來進入新制的當地小學，和泰州淮東中學（後來成為泰中）。十五歲時，日本屢次在中國造成事故，那一年是五卅慘案，又是殺害中國工人。中國的青年學生，舉國憤怒，錢先生也義憤填膺，主編「青年旬刊」，鼓吹民族自強，宣傳革命，為當地軍閥的駐軍，逮捕入獄，經過家人營救，方能回家。家人為了安全起見，送他到南京，由大哥存典先生照顧。次年，他與三位同學，投筆從戎，加入北伐軍方振武部，隨軍進入北京。北伐完成，他也退伍南返。這一段軍旅生活，雖然短促，卻因為他曾經駐紮在楊柳青，使他有機緣能夠直接觀察中國傳統彩色套印的技術。

回到南京以後，他投考金陵大學，兼讀歷史和圖書館學。當時中國只有三家大學，開有圖書館課程，金陵是其中之一。都是因為籌措生活費，他在金陵女子大學

圖書館，擔任編目員。承蒙金女大校長的特許，他也可以在金女大選讀功課，於是，他在兩校選讀的功課，跨越的範圍很寬，在一般的歷史課程中，除了中國歷史，他還選過歐洲史、俄國史、印度史和中日交通史，有關圖書館的編目學、書史等類科目，也選過翻譯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和科技歷史，在他從金大畢業時，他的學歷是主修歷史，副修圖書館學。這一段的經歷，使他的學問基礎，比一般圖書館學或歷史學，都更為廣闊，而且具有實務的經驗。

1932年，從金大畢業後，經校方推薦到上海交大，擔任大學圖書館的副館長，主管西文部，那個時候，中國圖書館擁有大量西文圖書的書藏者不多，他以管理交大圖書經驗，編印了西方圖書編目規則和西方圖書目錄，這是中國第一次有關西方圖書編目的專業規則。在交大任職五年，1937年，被國立北平圖書館延攬為南京分館的主任，專職管理以科學工程為主的圖書，這是他與北平圖書館終生關係的開始。北平圖書館是在滿清末年開始籌備，稱為「京師圖書館」，收藏是以「文津閣」的藏書為主體，再加上八國聯軍劫掠後，圓明園剩下的圖書，其中最珍貴的是「永樂大典」二百多部，堪稱世界最大的「永樂大典」遺存。北館也陸續蒐集了不少藏書家的書藏，和接收了北京一些皇室單位的書藏，於是，北館實質上是中國的國家圖書館。中央圖書館在南京成立以後，南北兩館是平行的兩大國家圖書館。

任職交大期間，錢先生結識了後來的錢師母許文錦女士。錢師母籍貫蘇州，據錢師母見告，錢先生每逢週末，必定從上海趕夜車到蘇州，清早就在許府報到，到週末的晚上，又趕夜車回上海。1936年，在南京金陵大學禮堂結婚。然後在上海新居。這一段美好的姻緣，從滄浪亭互許終身，到2008年師母故世，其中除了1947年到1949年之間，他們兩地分隔，七十年來，相敬相愛，互助互諒，比翼連理，彼此扶持，孟梁垂範，蔚為人間佳話。他們有三位千金：孝岑（Ginger, 1937-2008）、孝峨（Gloria, 1940-present, 久病住院療養）、孝岳（Mary, 1944-present）。孝岳與夫婿 Alex Dunkel，居住亞利桑那州，她在百事可樂主管推廣業務三十年，成績卓越，今年退休。

其時，滯留在美的中國留學生，大多還沒有安頓。



1957 年錢存訓先生（左 2）獲博士學位時全家合影

錢先生伉儷是少數有家有室的留美學人。雖然自己的收入也並不豐厚，錢府已是芝城青年華人依靠的「家」。家中同學們來去不斷，每逢週末和假期，更是一屋子人。除了在家接待學生以外，他們夫婦參加中國教會活動，和曾經在華的傳教人士（例如，天主教的伏開鵬神父，新教華北傳信會的 Ellen M. Studeley 女士）共同組織「美中西部中國留美學生服務協會（CSAS）」，幫助解決中國留美學生的生活困難，例如協助滯美人士轉變身分、交友婚嫁等事。他們是青年人依靠的長輩：在困惑迷茫時，他們安慰鼓勵；在困苦艱難時，他們伸手救援；在節慶思鄉時，他們給予家的溫暖；凡此，是許多當年老留學生，至今還常常提起的事。我在 1957 年到達芝城，五年之久，忝列門牆，受他們二老照顧之恩，已如前述。此處不贅。

回到他還沒出國前的情況，1937 年，他轉任北平圖書館駐南京分館主任。這時候，日本進迫中國，頻頻肇事，政府已經準備必要時的措施。北館的圖書，開始分批南運。1937 年，抗戰爆發，1938 年錢先生調任上海分館，處理北館圖書運到上海租界的工作。分批運到上海的圖書，主要是善本書，和一些有關科技發展的參考圖書。他的全家，包括老母和四、五位弟妹，以及子侄四餘口，都搬來上海租界，和錢先生新婚的家庭同住。

他在上海分處的工作，主要是將東南地區書刊，寄往已經遷到昆明的北館，和內遷的主要大學。那些善本書，非常珍貴，不敢冒險經過戰區運送內地。因此，北館的善本書，仍舊存放在上海的租界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些，放置在李玄伯（宗侗）先生在法租界的書庫（據李宗侗自傳，應為「車庫」）。過了一年，胡適之先生與北館的袁守和（同禮）先生商量，將這些重要的珍本圖書，運送美國寄放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，等待將來戰爭結束後，再運送回中國。政府還特派蔣慰堂（復璁）先生，潛返上海，督辦這一任務。這一個執行任務的責任，就交給錢先生處理了。錢先生自己和李府的工人，親自打包裝箱，準備交運。困難之處，在避開已經佔領上海的日本人耳目。幸而，錢師母的閨友有一位兄長，在江海關擔任驗貨員。經過他的同意，錢先生自己每天步行押運，用平板拉車，運送海關驗收，名義上是國會圖書館在上海採購的圖書，錢先生自己虛設行號，開發票，報關交運。1941 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終於將三千多卷、一百餘箱的圖書，從此離開上海，運去美國。1945 年，抗戰勝利，政府還都南京，教育部特頒發獎狀，表揚他保護重要文物的功績。——這是他一生非常重要的工作，既辛苦，又冒風險。有人問起他，你為什麼干冒如此危險？他的回答：「這是我的責任。」

這批圖書，留在國會圖書館，二戰結束，1947 年錢先生奉派赴美，準備將這些圖書運回中國。當時內戰已亟；他先將家眷送到遠離戰爭的貴陽，然後回上海，轉赴美國。1949 年，中華民國政府撤往臺灣，錢先生在美國，也無法回去接眷，在國會工作，是北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交換館員身分，並不是美國的職務；他的奉派公幹的身分，也不容許他在美申請工作。幸而，芝加哥大學的顧立雅（H. G. Creel）教授，有一批中文圖書，乏人管理，就向袁館長請求借用錢先生，替他整理這批圖書。由於移民法規，如上所說，他不能申請正式工作，因此，他在芝大只是顧先生的私人助手，薪俸也是由顧先生的研究費用支付。這一工作，確實開始了他大半生的事業。

這批珍本圖書，在 1965 年，由美國運回臺灣，歸還中央圖書館。其時，胡、袁二公均已歸道山；蔣、李二老，見面，執手互賀，又思念故人，悲欣交集。蔣慰堂

先生轉任故宮博物院，將這批圖書，存放在故博山洞的倉庫貯存，並且特製安全裝置的書架置放原裝的書箱。1984年，錢先生應臺北故宮博物院邀請，訪問臺灣，特往故博，眼看書箱的封條，宛然當初墨跡，內心十分激動。後來，他始終念念不忘，希望見到這批圖書終於回歸北館。2009年，他吩咐我，替他交涉，希望臺灣同意，將這批圖書，歸還北館。當時，雖然我盡力為之，仍因兩岸關係微妙，任何舉動，都可能節外生枝，以致不能成功報命。對他的囑咐，我沒能完成，只能勸解：國家大事為重，不宜因為這件事，妨礙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。而且，楚弓楚得，中國文化的珍貴文物，北館和故博，都是保管單位，也不必計較，誰是原主。回憶過去，錢先生和李師玄伯先生，都是我的恩師，胡適之先生和蔣慰堂先生也對我有提攜之惠。他們在這一歷史事件中，為了保護中國的文物，均曾經盡力以赴：今天，我也已老邁，作為旁觀的後生小輩，作此見證，鄭重盼望世人，明白前輩學者們珍惜中國文化傳承的的苦心孤詣。



1984年錢存訓先生於臺北故宮檢視運臺善本書箱

芝加哥的中國研究，是顧立雅先生開始的。他在北京學習時，為了自己的需要，購買了研究上的基本圖書，再加上著名漢學家勞福（Berthold Laufer）的書藏，本來贈送芝大的 Newberry Library，也經過校方轉移給中國研究圖書室。這一批書藏，存放在東方研究所的地下室。東方研究所本身的研究工作，是兩河和埃及的考古學，其實沒有中國研究。顧先生和另一位研究中國近古史的柯睿格（Edward Kracke）教授，為了將就這批圖書，也

在該所借用了研究室。於是，設立了一個東方文化研究系，包括中東和遠東的研究。不過，該系的學生，幾乎都是兼跨另外一個學科系，雙修專業和區域研究。

錢先生接管這圖書室，書藏已將近十萬本，可是並沒有編目。錢先生最初是一個人，和顧教授的一位秘書工六月女士（June Work）合作編目。1949年底，他得到美國的永久居留權，也因此調整在芝大的工作，擔任東亞與文學系的教授銜講師，兼任東亞圖書館館長。該年年底，錢師母和三個女兒，也終於來美團聚。錢師母也投入圖書整理工作。錢先生分類編目，錢師母書寫封皮和卡片。錢師母的一筆娟秀的小楷，今天還可以在芝大圖書的架上見到。芝大送往國會圖書館，作聯合編目的卡片，引起國會圖書館同仁的驚佩：「有如此好的書法！這是圖書卡片的珍品。」他們賢伉儷，共同努力，將這十萬卷書，幾乎整理大半，芝大才從聯邦的資助，取得經費，雇用正式的圖書館員和助手；那時，錢師母才離開了志工的職務，那時已經經過七、八年了。我在芝大讀書時，錢師母還在地下室寫卡片。

50年代開始，美國政府設立發展區域研究的經費，幫助各大學購置圖書。芝大每年得到相當的聯邦補助款，發展為東亞研究重點大學之一。錢先生是圖書館的專業人員，對中國文化和書籍的知識，又非常豐富，因此，在他手上，芝大陸續購置的圖書，都是非常珍貴而且實用的。我自己的經驗，國會和三、四家主要大學的東亞書藏，都起步甚早，不僅也有很好的善本珍本，例如唐代敦煌寫經、五代吳越錢氏刻本寶篋佛經、以及元、明刊本，有些甚至是孤本的圖書。芝大的手抄本和私人文書，也頗有別處未見的，例如，清朝晚年一些著名學者，彼此來往的信件和手札，這些都是世間難有的珍貴資料。除了圖書之外，錢先生還為芝大收集了一些文物，例如，古代的印章、封泥、簡牘等等。1978年離職退休時，芝大遠東書藏30萬餘卷，中文佔三分之二，已經是全國大學五大圖書館之一。他在主持遠東圖書館時也訓練助手，有些後來進入圖書館專業，在各處大學圖書館工作。

1957年到1962年之間，我在芝大讀博士學位，除了上課，大半的時候，都是在圖書室內，查書、看書，因此，有機會親眼目睹錢先生的工作方式。他每天工作

一段時候，必定在書架之間巡行，隨手把書架上放錯、或是放倒的圖書，放回應有的位置。我記得他的名言「最難找到的遺失圖書，是在書架上插錯了地方。」在幾十萬本書中，要找到一本插錯位置的書，猶如大海撈針，他隨手糾正，就為了避免這些小錯誤，造成的大麻煩。同樣，他核對卡片，每天他收集助手們編輯的卡片，自己重新過目檢驗，以求精確。就這種點點滴滴的工作，瑣碎而必要，使芝大圖書館訓練的圖書館員，經過謹嚴的訓練，都有別的大學羅致，獨當一面，或者在東亞大館，擔任梁柱。當然，對於使用圖書館的研究人員而說，假如沒有這些精確的編目和排列，尋找一本圖書，就不是方便的事情了。

1958年，遠東圖書館遷移到當時總館 Harper Library；同時，中文圖書以外，又增加了日文和韓文。1970年，遷入芝大新建的 Regenstein Library。地方寬敞，設備齊全，是許多大學圖書館中，著名的合用又舒適的大廈。設計這座大廈時，錢先生是建築委員會的委員，他建議，整個外型不要採取對稱，寧可是不規律的多角形，以方便將來在任何角落，增加一翼，或者在某一處加蓋一、二層，都不致妨害外觀。我後來在匹大服務，匹大的圖書館形狀規整，方方正正一片，全無增建的餘地，四周也沒有空地可開拓空間；至今大家非常懊悔，設計建築式樣，沒有預留將來擴張的餘地。

錢先生在芝大的圖書館系，開設的東方圖書館學課程，和在東亞語文系，開設的史料導讀，都是芝大訓練東方學年輕學者的必修課。他在圖書館工作，一些研究生經常會向他請教，應該查看哪些書？他會自己帶領學生，從書架上取書，仔細地解釋，這些書的內容如何，以及怎麼樣和研究專題配合。我在離開芝加哥大學前最後一年，他也在圖書館內，為我設立了一個小的玻璃隔間，讓我幫助研究生解決研究專題和尋找書籍的橋梁。這也算是我短期分擔了他的工作。

1962年，他在芝大的東亞語文系和圖書館學的研究院擔任正教授，兼任遠東圖書館館長。1969年，他接受聯邦教育部的委託，在芝大開設遠東圖書館學暑期講學班，訓練各處的專業人員。他在圖書館系，指導博士研究生，訓練高級圖書館員，正式的學生和暑期訓練班的學員中，有不少人已經是美國著名大館的館長。臺灣、

香港的一些重要圖書館，也有他的門生子弟。

錢先生在發展芝大遠東圖書館和教學以外，也全力以赴做自己的研究工作。他在芝大一面工作，一面選修研究所的課程，十年之力，完成了圖書館學研究院的博士學位。在這一個階段，他深受芝大當時圖書館研究所幾位資深教授的影響，對於文字記錄發展歷史，以及這些記錄和傳播訊息的關係，有深刻的感受。從這一角度，他對於古代印刷和書籍史的研究工作，實已擺脫了傳統版本學的範疇。他的資料有很多從考古學以及實體的文物，直接從事工藝範疇的研究；另一方面，由於他注意訊息傳播的影響，他也在考察書籍歷史時，常常顧及知識傳播和當代文化以及社會之間的關係。這些特點，使得錢先生的研究工作，不受圖書館學的限制，而成為文化史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。

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時，他的研究工作是印刷以前的書寫方式和其發展，成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。畢業以後，他從博士論文改寫，成為第一部英文的研究專書，書名是“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: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（書於竹帛）”196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。新書問世，立刻成為中國研究和圖書館研究的熱門書，三個月之內，第一版售罄，從1962年到1969年，連續兩次再版。這本書的中文本，名為「中國古代書史」，是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這本書曾經經過韓日的學者，翻譯成韓文、日文，各種版本陸續經過增訂，流傳廣遠，成為圖書館界的經典著作。該書內容，主要是討論青銅器上銘刻的文字、陶文、玉件刻辭，然後，再討論絲帛、竹簡、木板上的書寫。其中材料，幾乎都與考古學有密切的關係。在這本書中，讀者可發現許多有趣的問題，從來不被注意，卻是經過錢先生的解釋後，恍然大悟。例如，為什麼中文的排列，是從上到下、從右到左？他的解釋：中文用竹簡書寫，竹片窄窄的一條，從上往下寫，左手持簡，右手書寫，最為方便，寫完以後，右手將竹簡順手放在右邊，如此進行，竹簡編列成冊，就形成了從右到左、從上到下的體例。相對而言，西方古代的文字，例如，埃及的紙草，卻是必須左邊壓住，右邊向右一行行推開，就發展了從左到右的體例。另一例子：刀、筆二字，常常連用，如果書寫者，要臨時削竹簡，哪有這個功夫？

他的解釋：刀是書刀，用來削除錯誤的文字；孔子著《春秋》，「筆則筆，削則削」，以為行文時的改正。書刀是寫作必備的工具。經過如此解釋，少數存留下的青銅小刀，在使用方面，就有了著落。

另外一部重要的專書，這部書乃是中國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編著，《中國科技與文明史》系列的一個分冊。1967年，李約瑟邀請他，在該系列的第五卷第一冊撰寫一章。沒料到，因為材料眾多，論述複雜，從一章擴張到一百餘頁，終於又擴張到一部三十多萬字的專書。費時十五年，錢先生終於完成了這一部巨著，在這一領域內的經典著作。英文所謂“A definitive work”，是關於這個題目，至矣盡矣的著作。在李約瑟的巨著系列中，這部書佔有獨特的地位。

這部討論中國造紙術發明以後，造紙、印刷與出版的著作，正好接上「書於竹帛」——一本討論古代抄寫的書籍；這一本書，論述紙張和印刷出現以後，資訊大量傳播的新現象。該書分成十章，其中造紙、印刷（包括製墨和裝訂）以及傳播，各三章，另外緒論一章，和提要，引用的資料兩千多條。1982年全書完成，1985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，1987年立刻重版到第三版，成為李約瑟巨著系列中，最為暢銷的一本。因為這本書的成功，李約瑟東亞科技研究所聘請錢先生為終身研究員。

這本書的資料，很多是考古所獲的實物，也有不少留傳的古籍和刻版。以紙張本身而論，中國古代紙張的實物，不斷經由考古學家在各處發現；每次有新的考古資料，錢先生必定納入書稿。這本巨著，耗時十五年才完工；有好幾次，就是因為新的材料出世，為了討論這新資料，他不惜整章整節，全部改寫。他工作謹嚴如此，也無怪著作能夠成為經典。

這本書的中文譯本有多種版本，大陸上的版本，書名為「紙和印刷」，1990年上海出版，是劉祖慰譯著，作為送給李約瑟先生九十歲壽禮。臺灣的譯本，則是由劉拓和劉次昕父女翻譯，書名為「造紙和印刷」，199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日文和韓文也均有翻譯本，在本文同時刊載的書目中，可以查到，此處不贅。

在這部巨著中，錢先生自己覺得，應該特別關注之處，則是印刷術發明造成的影響，乃是將中國文化的載

具，文字資料，經過印刷，深入社會各階層，也廣佈於中國文化涵蓋的地區。因此，印刷術的出現，於中國文化區的整合與擴大，有重大的影響。他特別提出，在西方，印刷術的出現的影響，卻完全不同。他以為西方民族國家的湧現的過程，與各民族均可用自己的文字傳述自己的歷史資產，彼此之間頗有關係。印刷術出現於歐洲以後，自由思想得以挑戰宗教權威，從宗教革命到啟蒙運動，一切的知識傳播，都與印刷文獻的傳播，有密切的關係。錢先生這一類的討論，正是反映他從專門的科技史上，看出社會與文化史的意義。

另外兩部著作：「中國書籍、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」和「中美書緣」，兩者都是散篇及雜文，前者是「書於竹帛」和「造紙與印刷」的副產品；那兩本書中，一些特殊的課題，都經過錢先生自己，深刻地研究，然後才落筆。這些研究工作，也就是上述二書的前者。例如，書刀的研究，在「書於竹帛」中只是幾節陳述；可是，為了證實如此陳述，錢先生寫了一萬字的論文。「中美書緣」則是論述，中國與美國之間，書籍與文獻的交流：一方面，論述西文的譯著，對中國近代發展的影響，另一方面，則是美國各處重要中文書藏的發展過程。其中許多項目，都是他親身的經歷，言之娓娓動聽。他的許多著作，散見於書刊與研究報告，大家可以參看與本文同刊的書目，由錢先生及門弟子潘銘榮先生編，錢孝文兄增補，非常詳細。

錢先生碩德大年，一生經歷宏富，成就非凡。舉凡保護珍貴書藏、建立芝大遠東圖書館、研究書籍歷史、教誨訓練後進，無不功績斑斑。他為人仁善，愛護後生，都是仁者的楷模。如本文前面所說，我自己深受其惠，終生不忘。其做事勤奮，一絲不苟，乃是其事業成功的原因。君子三達德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」，錢先生當之無愧。博厚高明、天賜大年，在他一百零二歲時，還是不斷工作，直到最後三年，身體漸衰，才頤養天年。錢先生是基督徒，我借用《聖經》上的話語，他的一生確實符合「美好的戰已經打過」。在一百零五歲的時候，錢先生安靜地歸去。我自己深受錢先生的庇護，視同自家子弟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對他們的言行，終生不忘。現在我也已經八十五歲，為錢先生撰寫行述，感激不已，盼望以此篇幅，將這位長者的言行，縷述如上。